

第一章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种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术流派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某些幻想信以为真……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的基础上去……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的热情，而是宣扬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了。”^①“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引起的，那么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②在《共产党宣言》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被概括为：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满以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③。

译者补。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5 页。——译者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我们好像目睹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复苏。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下使用缩略语 NTS 代指“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实质上是将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这一思潮最明确的特征是使意识形态与政治脱离任何社会基础，特别是任何的阶级基础。与此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自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为其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社会主义的斗争。而 NTS 则认为由于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可能并不具优先性地位。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这些理论策略有效地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NTS 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并以不同的理论风格被表达出来。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是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 比如 包括 E. 拉克劳 巴里·汉迪思 保罗·赫斯 以及 G. S. 琼斯。在英语国家中，NTS 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阵地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 这是英国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刊物。NTS 在理论与政治上与大陆及英国“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已经建立起了从共产主义者到工人党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找到了其阐释者和代言人。

在某种程度上，NTS 可以被当作是所谓的“新修正主义”^③，但也必须对此明确加以区分，希望能弄清的是，被“新修正主义者”用来支撑自己政治观点的精致的理论公式——尽管他们也

声明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背离 实质是对其本质前提的抛弃。总而言之，“新修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共同政治原则的思潮。这些原则拒斥了阶级政治的首要性 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对于 NTS 来说，这些政治原则需要对社会现实，至少是使其得以解释的理论构件彻底地作一个重新评估。同样可能真实的是 那些支持了这种理论反思的人，一般都属于新修正主义者的“极右翼”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界定 对其“同志”来说则是过于极端化的。这或许意味着，右倾的幅度与理论的精致性、复杂性 更不要说其虚伪性与模糊性了 程度是直接相关的。无论如何，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将会是这一思潮的某个部分 这不仅有助于理论的重建 而且将可以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来对这一思潮加以准确界定。

不管这一运动是多么复杂，不管其全部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能认同于相同的原则，但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

(1)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

(2)这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阶级与政治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偶然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与政治是（相对地 绝对地？）独立于经济的 阶级 关系之外的，不存在建基于诸如“经济”的阶级利益之上并能被转译成政治话语的东西；

(3)这些问题尤其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即，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 而且 工人阶级在实质上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兴趣”；

(4)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

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成可以多多少少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 这尤其意味着以下的两种情况：

（5）一种政治性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 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各种式样的‘人民’因素建成 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6）确当的社会主义目标一定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我们可以在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 把这些目标向不同类型的人们加以述说，而不管他们物质阶级境况如何；

（7）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 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 用‘激进民主’的说法来置换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可被说成是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 或者 无论如何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尽管民主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 但它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 能够被拓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NTS 首先便是以此种形式存在 并在像塞缪尔·鲍尔斯和赫尔伯特·金蒂思等人那里得到了精致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这不仅代表了社会主义目标的重新界定（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的消亡相一致）而且是拒绝了对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明显，整个这一论断的逻辑要求把物质生产降低为至多不过是社会生活构成中的次要性因素。由于社会主义方案与任何特定的阶级相脱离，它在‘人民同盟’这一社会集团中被重新定位 其角色认同、聚凝的原则、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 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因此，NTS 作了这样的假定，即存在着并非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状

况的历史性力量 存在着这样的集团组织 它所声称的具有战略地位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中没有根基。更确切地说 战略性力量与集体行动能力的拥有 并不被认为是确定社会改造的动力因素的本质标准。

极端一点而言 使意识形态与政治‘独立化’的理论倾向 是与那种把语言和‘话语’建构当作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 与之相关 某些‘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后结构主义的合拢，最终使意识形态与观念同任何社会与历史基础相分离。这种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语言，迂回反复以至最后的虚无主义的做法的不足之处，已经遭到了佩里·安德森深刻揭露与批判。^① 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是如何被运用于这样一种政治策略中去 这种策略认为 社会和政治力量是由话语本身构成的，在社会关系中几乎没有基础。

因此，NTS 方案的实现似乎要寄希望于一个宽泛而松散的联合体 在联合体的内部 除了大都是来自于一种起源模糊的独立意识形态之外，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新的“真正的”的社会主义者们看上去一致认可下列的观点 即 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那些所谓‘公平正直’的人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在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层面之上，而在于他们对理性与言说的敏感性。尤为特殊的是，知识分子试图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相当显著的，但是 即使在不够显著的情况下 也可以这样认为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必定要在其社会主义方案中，赋予知识分子以决定性的角色 因为这一方案要依赖于知识分子去完成 而且 这一任务是相当重的，不会比通过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方式去建构社会动因更轻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话语的载体——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外，由尚未成熟的大众构成的‘人民’主体仍然不具有集体化的特征和组织起来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补充一条最终原则：

(8) 比较而言 某些类型的人对于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主义话语更为敏感，更能够认同于一般性的人类目标，更加明显地排斥狭隘的、物质的——或者常被边沁称为是“邪恶的”——利益；这些人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注意到以理性、人道主义目标为一方，以物质利益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敌对——是极为重要的。）

至少 所有的 NTS 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即 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并没有优先性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他（阶级）更自然而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然而，有些人甚至会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或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比起其他社会群体更不太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政治。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不具必然性，而且，其本质特征却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

然而，在这个论断中或许有一个矛盾。尽管根本原则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但现在看上去至少就工人阶级而言 经济-阶级状况确实是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只不过不是以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而已。这一判断如果能够成立，就必须依赖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经济状况本身决定了其他现象能够独立于他们的程度，或者去响应一个著名的阿尔都塞式的公式——经济在最终意义上具有决定性，只有在此种意义上，经济才是决定性或支配性的；而且，有些经济状况决定了经济本身将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其他的经济状况则决定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将是相对独立的或是占支配地位的。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达，这个判断就是这样的，即，某些阶级条件决定了民众

边沁 (1748-1832) 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 建立了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

将与物质必需联结在一起，而其他条件则允许更大的知识与道德的自由。换句话说，更能够拥有“正确的思想”，因而能够更敏感于社会主义话语。

因此，人们更乐于去选择社会主义政治，他们越是独立于阶级的物质状况，就越是具有去响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因此，工人阶级之所以并非最适合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选民，不单单是因为物质利益倾向于产生一种“经济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的政治，而毋宁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就是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一个经典的保守原则基础上被重构了，这种保守性原则可以上溯整个漫长的政治思想史，直至柏拉图式的反民主的哲学。但更多的关于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将在后面展开。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的大部分是谈不上“新”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不过是旧调重弹，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只需被“拓展”便可延伸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是那种关于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更高理想，且这种理想能够吸引所有“公平正直”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样的阶级，的想法将会得到比如说诸如 M. 拉姆塞^{*}和 J. S. 穆勒^{**}的认同。NTS 的新颖之处在于，其阐释者坚持认为，他们要么与马克思主义，要么与其后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即使那些（如 E. 拉克劳、C. 墨菲）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且已游移至 NTS 思潮的右翼极端的人，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他们主要的构成

拉姆塞·麦克唐纳。——译者注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其著作甚多，有《逻辑体系》（184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译者注

性传统之一 只不过“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有效范围……”^{91⑤}。这些声明指出了这一思潮最具特色的一些方面 特别是它复杂的、虚伪的、捉摸不定的理论歪曲 与直白无饰的、不求精致理论包装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们需要回答的是 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 它何以现在得以凸显, 又何以能在英语国家找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生长点。当然 从广义上说 在过去的 10 年左右 它是对‘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大潮, 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然而 必须强调的是 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在他关于‘新修正主义’的评论中所指出的 这种现象‘已经在其他国家以更糟的和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呈现出来, 特别是在法国 已经产生的甚至不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而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与蒙昧主义’^{92⑥}。英国的 NTS 当然没有考虑得这么深刻 从这种观点看来 它拒绝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背离——不管这种拒绝将会如何地误导——的做法可能被解释成一种肯定性的声明, 以表达其对于某种社会主义价值的永久性承诺。然而, 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的抛弃 这当然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NTS 思潮形成发展的时期大约是在 1976 - 1985 年 尽管

拉尔夫·密里本德 生于 1924 年 自 1949 年起历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利兹大学政治学教授, 现执教于美国布兰代斯大学。1964 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纪事》的主编之一, 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定影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 他以国家为什么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 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结合起来, 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具主义的分析。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国家政权与阶级利益》。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学说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作用和运行机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译者注

它直接的理论先导——归根到底是来自阿尔都塞——可以回溯至这样的一个理论-政治框架，对于这一框架来说，1968 年是一个关键时刻。如同我们在探究理论背景时将会看到的一样，存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理论演变的轨程，即，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引入的毛主义——这是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启发的——到欧洲共产主义 而且是直指其“右”。从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到拉克劳的这一条线 多多少少地勾画出了 NTS 的理论 与政治变演过程 在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标志性的分界点。在英国 汉迪思和赫斯严格遵循了这一变演的轨程 对他们来说，1975 - 1976 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短短的两年内，当他们完成了从毛主义式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最后遗迹，到后阿尔都塞主义右翼劳工主义的开端这样的一个行程，其他人已经在多少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走过了同样的旅程 比如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停留在英国共产主义限定的范围之内。当前英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即是这种倾向的明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期，究竟发生了哪些能够解释这一演进的事情呢？我们需解释的不只是那种令人失望的大气候或者是左翼神经的麻木 而是这种以特定的形式 在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一特定的地方 从社会主义战场撤离的原因。关于“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因 或许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此问题上，密里本德曾经简要概括如下：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 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
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
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
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

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特别是在英国，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有着“撒切尔主义”的创痕，尤其创伤性的是其赢得选举的能力。^⑦

最后一条提及了一个对于 NTS 的解释或许是最为直接的或特别相关的因素。与 NTS 的发展有着最为明显的历史性关联的是“新右派”（特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演变。一般而言，说 NTS 是对“新右派”成长的一个“响应”，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进展。我们仍然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特殊响应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既然“撒切尔主义”的特征在于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出发来省察世界，既然撒切尔政府初衷是调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已经过多地染上了有利劳工的色彩——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的回应就是要否认阶级政治的核心性，将阶级政治问题理论化，而不是直面撒切尔主义本身，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回应，就是在阶级斗争中站到了由撒切尔所资助的另一边？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如此沉迷于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伪装”——其所谓“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关注于它在反对劳工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做法？

因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或许最好是不把 NTS 简单地当作对于“新右派”的回应，而是当作对于导致“新右派”产生的同一起因的一种回应。几乎不用怀疑的是，英国“新右派”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冲动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劳工好战性因素的爆发，接下来的是 1968 年到 1969 年这一段时期内欧洲的激进主义，特别是在 1972 和 1974 年矿工罢工以及海斯（Heath）政府的失败。撒切尔以非常明确的“永不再来”面目而出现，并且伴随着一个明确的决心，就是要打赢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阶级战争。1978 - 1979 年“失望的冬天”更是火上浇

油。NTS 的演变正与这些好战性事件相吻合，并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又一戏剧性时刻即 1984 - 1985 年的矿工罢工中达至成熟。而且，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伴随着 NTS 理论的深入发展。

因此，有理由认为，NTS 的演进——自始至终是与工人阶级好战性相关联的，而且将会在连续性的爆发之间得以加剧——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最近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着某些联系的。然而，很难让那些历史的见证人去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 NTS 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迁的因素这一观点的抛弃，所代表的将仅仅是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平息时期社会主义者一方的失望。

每当欧洲国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战性时，就准备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别是在英国，每当好战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理论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这其中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呢？对于这个明显的悖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上，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正是由于好战性的这样一种显现而产生，因为这种好战性在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无法得以勃发。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所没有充分涉及的一些问题。然而，还有其他可能性因素是不可忽略不计的，比如学术时尚的诱惑；“话语”成为 80 年代的风格，或者可能的是，甚至有些挑剔的中产阶级也对工人阶级——谈不上害怕——不感兴趣，以及对削减服务所致的不适的愤然拒绝。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急切期盼着的“好战性”，在实践中却总是迟迟不来。

无论如何，如果说 NTS 的具体历史性起因还必然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的话，那么它的理论起源还是有案可查的。因此，我们可以对其理论先驱做些考察。

第二章 通向 NTS 之路 阶级斗争及 工人阶级的移置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应在两种不可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正是阶级斗争被马克思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阶级的消亡——阶级斗争的最终产物——是革命进程的最终目标。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 惟独这样的一个阶级 其阶级利益要求——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阶级本身的灭亡。这种历史观与革命目标的不可分割性，最能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构思区别开来，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太明显了，以至于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可以认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是以离这些原则逐渐远去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景越来越为权力斗争所支配。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设想那里，获取政治权力本是消灭阶级的一个方面或工具，而如今，阶级斗争渐渐倾向于表现为一种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发生了变化，这并不局限于那种以夺取权力为主要目的的运动中，还在于它是通过“民主的”或选举的手段而获得权力。在革命运动中也已经出现重要分歧，已经把起义（暴力）行动作为夺取权力斗争的一种可能的甚至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20 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受历史环境制

约，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把权力斗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中国）把“人民”或“群众”放在“阶级”之前，将其作为斗争的主要因素。在这些个案中，这些变化取决于夺取权力并把握住不可拒绝的机会的直接要求，而且，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充分成长起来了的工人阶级。然而“人民战争”的原则以及权力竞争的重要性，以不同状况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其结局也不一致。这里，权力斗争越来越意味着选举竞争；尽管工人阶级是庞大的甚至是压倒多数的，但“人民”和“群众”已经不再主要意味着一个被剥削阶级——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选举的力量已经成为联合的主要标准，而对于“人民”联合的构成分子来说，它们是否要以阶级的消亡，甚至更具体一点，是否以资本主义剥削的消亡为目标，以及他们是否拥有达到这些目标的具战略性的社会力量，则是没有关系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潜在的意旨已经是在远离革命而去，从而把阶级斗争连同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中置换出去。

这些历史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复杂影响。或许可能的是，作为一条导线，这一理论将贯穿于历史变化的复杂性、政治斗争的妥协性之中，作为一种手段，用阶级斗争这一永恒的明灯照亮这些进程，并指明其最终目的，分析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新的框架的发展变化，在明确革命目标的同时，又为新的斗争形式奠定基础。与之相反，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自身与实践联系起来以后，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管是以革命行动的形式，还是以选举联合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权力竞争的直接需要。

在近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这一理论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特别是其“人民同盟”的竞选策略的理论基础。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建设社会

主义，仍然是预设了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社会，但这一目标已经不再照亮革命性变革的整个进程。相反，这个进程已经被歪曲为政治策略的直接需求，以及政治席位的获得。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再设计为通过驱除挡路的资本主义妖魔，从而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相反，正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妖魔已经被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中，这一理论主要不再能贯穿于阶级形成的进程或是阶级斗争的道路中，而只是为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奠定基础，正如他们此时此地正在做的一样，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共事业中的席位。

这样一种关于革命方案的重新构思，也有助于强化这样的倾向：即，把工人阶级移置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外。不管这种移置是由斗争力量的迫切需要所决定，还是由在西方非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面前产生的失望所决定，或者只是由保守的或反民主的冲动所决定，对于革命‘替身’的追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不管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与其相伴随的是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革命性进程的整个构思的重新界定，但是，为了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方案——无论从手段的角度还是从目的的角度，就必须把工人阶级置换出去。

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其传统意义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当作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关系和力量的综合分析的结论。首先，这一结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认为生产关系的剥削特征是社会与政治压迫的根源，工人阶级是潜在的革命性阶级，这一切并非是形而上的抽象，而是唯物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它表明，如果假定生产与剥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核心地位，假定生产与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这样的性质，那么，由此而来的另外一些主张就是：

(1)在引发通往社会主义的变迁方面，工人阶级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2)工人阶级作为最基本的、最具决定性的——当然尽管不是惟一的——被压迫对象，它的利益并不依赖于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它能够在解放自己的斗争中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3)假定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位于压迫结构核心）的对立是根本性的、最终不可调和的，那么，阶级斗争就必然是这种解放性改造的主要动力；(4)工人阶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足以允许其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在这种分析的背后是一种解放性视角，它渴望在人类努力的各个层面上——从劳动的创造性权力到国家的政治权力——摆脱权力的异化。

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斗争中置换出去，这要么是一个总的战略性错误，要么便是对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分析的一个挑战，而且至少是重新定义了由社会主义所赋予的解放之本质。然而，很重要的一是传统的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与利益的不同分析的有效挑战。当然，这并不否认许多人曾经质疑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不否认他们也曾提到了其他的革命性因素，比如，学生、妇女、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以及这种或那种的人民同盟，还有就是最近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

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观，有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浅薄的”攻击，对此，我们需要做些深入思考，以证明迄今为止这些不同观点的策略性破产。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既是乌托

邦的幻想，也是令人失望的空想。高兹的推理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 即 既然社会的未来必然基于劳动的取消 那么 社会主义的目标，必然就是去确定劳动将以何种特定方式被取消——比如说是大众失业率降低抑或是“自由时间”的解放 他设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二元社会构成的非连续性社会空间。^⑧由满足主要需要的必需的物质生产构成的必然王国”——一个永远不能完全回避的领域——和一个可以不受必需的社会生产制约的自由王国。自主领域必须扩大，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必须缩小。工人阶级就其实质而言 不能成为社会改造与变迁的主体 这是因为对工人来说，取消劳动不是它的目的。作为一个阶级而言，^⑨工人阶级的劳动与资本的逻辑相认同，它本身不过是资本的复制品“；对于现存的生产力来说 这个阶级的利益、能力和技巧是有效的 也只是对于资本的理性才是有效的”。同时 这个阶级的力量已经被劳动过程本身的形式和结构所摧毁。因此，变革的冲动必然是来自一个“非阶级的非工人”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⑩ 对这些人来说 工作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和外力强加的义务 他们的目的是“取消工人与劳动而不是拨款”^⑪。这一群体包括所有那些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失业或半失业者 以及所有当代社会生产的“多余者”，他们或许会与类似生态学和妇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走到一起去。

关于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进程及其对于工人阶级影响的分析 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疑问。关键之处在于 他的整个论断是基于一种歪曲了的技术主义，一种劳动进程的拜物教 和一种到劳动的技术进程而不是到生产关系即剥削的特定模式中去寻找生产方式的实质的倾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后阿尔都塞理论家比如普兰查斯是共通的，在上述二者那里，这种更多的不是根据剥削关系而是根据劳动的技术过程中

确定阶级的倾向 或许有助于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具有严格规定性的概念，工人阶级看上去只是包括产业化的体力劳动者。这种倾向同样影响了他对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潜力的认识。既然在他的描述中 关于剥削、对立的生​​产关系以及斗争的经历——比如对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经历——在工人阶级意识的构成中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意识完全被劳动的技术进程所塑造与同化。工人阶级结构的确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点是必然要去严肃面对的 但是 高兹对此却几乎未做说明 因为在最终 他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局限性的界定是形而上意义上的 而非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 这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经历以及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几乎没有关系。

关于高兹本人的乌托邦观点同样可以被质疑。然而，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不仅仅就是高兹乌托邦中这样或那样的令人不快的特征 而是这样一些事实 即 乌托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没有根基 实际上完全是基于失望之中（并非偶然的是，高兹关于乌托邦的论述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人们一夜醒来 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在最后的分析中 高兹并没有提出替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主体），结果是 非阶级的非工人 这一革命的流氓无产者，预先勾画了一个新的社会，而且只是在原则上、概念上或许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去践履这一承诺。就高兹本人的依据而言 这一“非阶级的非工人”不存在战略性的社会力量以及行动的可能性。最后留给我们的 不过是比重炒“反文化”的冷饭稍好一些而已 在资本主义荒原的一块飞地中见证了“反体系”的事实。这种革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 打个比方就如同是从穆勒提出的毫无意义的‘社会主义’到资产阶级花童在公共橱窗中长成巨人的梦想（而资产阶级爸爸经常要从家里汇钱过来）

尽管左派的目的可以被认为是要取消劳动——不是废除阶